

●张树声 郑继丰

西方学者论天一阁

ABSTRACT Ulrich Stackmann, a German scholar who has written a book entitled "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Bibliothek Tian Yi Ge vom 16. Jahrhundert in die Gegenwart" approaches in detail the history of Tian Yi Ge. Starting with some related catalogs of acquisitions he probes into the several-hundred-year-long activities of collecting materials and catalog compiling, and also the social impact of Tian Yi Ge, etc.

SUBJECT TERMS Store-house for books-Qing Dynasty Tian Yi Ge Collection-Studies

CLASS NUMBER G258.83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施塔克曼(Ulrich Stackmann)在1990年出版了《中国图书馆“天一阁”的历史》一书,详尽探讨了天一阁的历史。由于东西方文化间巨大的差异,而且有些中国古老文献很难准确地译成外文,又兼施塔克曼手头不可能有很多原始文献,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不甚恰当的结论。但无论如何,施塔克曼客观地肯定了天一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他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人一般的观点。

施塔克曼认为,中国在清朝时,私人藏书楼比比皆是,藏书范围广、数量大,学校、寺院甚至皇宫的藏书楼对于中国原始文献的流传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天一阁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著名的藏书楼,在文化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天一阁的著名,不仅由于它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还在于历代官员和著名学者都曾对天一阁极为关注,甚至乾隆皇帝也对它极为推崇,给予它的主人范家以最高的荣誉,还曾在一些地方仿

照天一阁兴建了七阁,以收藏《四库全书》,表明了天一阁的历史优于其他藏书楼。

施塔克曼认为天一阁历史的原始文献主要有两大类:藏书目录中的前言和后记,以及有关“藏书记”。同时他认为这两类原始文献的报道,需批判性地接受,因为作者往往被藏书家的名望所左右。1949年以来,台湾及大陆的学者发表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报告,价值各异。其中他特别高度评价了骆兆平先生,认为他是中国一位非常杰出的天一阁问题专家。他在书中好几次提到骆兆平对图书馆的贡献:“按照骆兆平出版的书、论文等来看,可以说他是中国一位非常有学问的专家。”

施塔克曼认为天一阁藏书的影响是通过与其他收集者建立关系和在官吏之间互相展示而逐渐扩大的。对范钦藏书有关系的亲属是他的侄子范大澈,交往最多的朋友首推太仓王世贞。虽然天一阁规定不允许外人进入藏书楼,但是,至少在建阁初期,天一阁曾作为社会活动的场所。他的依据来自范钦自撰

的两首诗,并有资料证实:范钦至少与太仓王世贞都负有互相交换藏书目录的义务,任何一方都有权利进入对方藏书楼抄录或请对方抄录自己所需要的书籍,因此并非一开始就禁止外人入阁,至少并非禁止任何外人入阁。

自范钦以后,天一阁才自我封闭了一百多年,直到清朝初期,黄宗羲破例登阁,对藏书楼给予了高度评价,引起了许多著名学者争相拜访天一阁的局面。万斯同、徐乾学、全祖望、钱大昕等先后造访过天一阁。由此可见,天一阁在当时就已有较大的知名度。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下令编纂《四库全书》前后,天一阁是鼎盛时期。尤其是由于天一阁进呈书籍有功,范氏族人接二连三地获得了荣誉:1774 年乾隆皇帝亲赐《古今图书集成》,还在两本进呈书上御笔题诗;1779 年和 1787 年乾隆皇帝又分别赠送了一套铜版画。所有这一切,使天一阁荣极一时,成为中国藏书爱好者效仿的楷模。

对于御赐铜版画的原因,施塔克曼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怀疑陈登元的观点:认为皇帝为了确保这些艺术精品流传后世,选择了天一阁这个历史悠久的藏书楼作为收藏地。他认为,当时皇帝已巩固了政权,收藏在自己的藏书室,也能保证万无一失,没有必要更信任一个汉族的私人藏书楼。他认为,铜版画对于中国是一项新技术,该技术能使皇帝在画面上附加自撰的诗词永保身后荣誉。只有通过一些有声望的、规模较大的藏书楼,才能保证永远广泛流传,因此,他还同时赠给了另外三家藏书楼。铜版画的题材还意味着皇帝在向被他征服的人民示威,或说是统治阶级对反清情绪强烈与否的一种试探,因为当时皇帝一直怀疑汉族人民对他的统治不满。

19 世纪以来,由于战乱频繁,中外一些不法之徒和无知之辈趁机明抢暗盗,天一阁藏书多次遭受惨重损失,虽然范家作了种种努力,但天一阁还是每况愈下,仅凭范氏一族的力量已回天无力。因此,当地政府官员积极

介入天一阁管理,他们与范氏族人组成了“文献委员会”,并于 1933 年大规模重修天一阁,历时三年。抗战期间,还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藏书大转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范氏后人把天一阁捐献给了国家,这才结束了历时 400 余年的私人藏书楼历史,也使多灾多难的藏书楼获得了新生,大量散落民间的善本书重回天一阁,藏书量与日俱增。施塔克曼援引骆兆平的话说,1980 年藏书总数超过了 30 万卷,其中珍品达 8 万卷,大部分回归藏书系民间藏书家捐赠。

天一阁有很长的编目历史,总共有 17 部目录,有一部分已失传。施塔克曼承认他手头也未收集全现存目录,他对现存目录的论述是根据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所述进行的。

施塔克曼认为,与欧洲藏书楼目录相比,天一阁藏书目录的流传是不同寻常的,其流传历史表明,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看到天一阁藏书目录,这不仅说明人们对藏书目录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表明了天一阁藏书有着重大的价值。

天一阁的早期目录仅是手抄本。第一个手抄本目录《东明目录》记载于《万卷堂藏书目录》中。后来黄宗羲破例登阁,编成第四个目录《天一阁书目》,被他的学生辗转传抄,天一阁目录流传更广了。由于天一阁规则所限,轻易不允许外人入阁,但在知名的熟人范围内,范氏后人渴望扩大藏书楼影响,炫耀祖宗殊荣的。例如,范光仰曾在任职期间,主动把天一阁藏书目录献给他上司。由此观之,施塔克曼认为,天一阁藏书目录手抄本在其他遥远的地方出现,是不难解释的。

随着第一册刻印的目录出现,施塔克曼认为肯定可以流传到一般的公众手里。由于该目录仅按书橱排列顺序编目,且仅提供书名和卷数,因此对不能入阁者使用不便,且意义不大。施塔克曼推测,可能由于这个原因,阮元才于 6 年以后发起编成了《天一阁书

目》。他认为这是第一个独立出版的刻印目录，按类别编排，说明详细，估计晚清时许多藏书室都可以找到该目录的遗迹，并且有相当数量流传到了欧洲。

在以后一百多年里，也编成了一些目录。虽然19世纪起，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开拓了大量的藏书出版物，但是，施塔克曼认为，仅通过早期刻印，其流传的范围终究有限。1940年，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正式铅印问世，同时出现了一个专门复制机构，承担天一阁藏书的复制业务，使读者有机会获得自己所希望的复本。遗憾的是，到此时天一阁几经劫难，藏书已损失惨重。

参加天一阁藏书编目的人员，在目录中都有记载（有一部分载于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中）。施塔克曼认为这些人员职责各有差别，他把编目人员分为发起人、编者及协助者三类。据他所知，每次编目均由著名人士提出，许多发起人同时也是编者，因此，他认为纯粹的发起人仅有4个。在早期的编目中，不存在三类人员的划分，如范氏成员编成的早期手抄本目录，黄宗羲于1673年编成的《天一阁书目》等。自19世纪起则有区别，1808年发起人是阮元，范家二人为编者，其余6~7人作为辅助人员参加编目工作，以后几次编目，范家要么仅是协助者，要么干脆不参加。施塔克曼认为，1808年以后，范氏已极少有兴趣继续扩大藏书楼影响，这有可能是出于保护藏书以免继续遭受损失的考虑，同时也有可能是由于经济拮据所致。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世纪一些高级官员却对天一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地方官员阮元、刘喜海、宗源瀚、薛福成等，要么作为发起人，要么亲自编目。尽管范氏管理规定不许外人入阁，但他们终能获得准入阁，阮元甚至命令范氏成员编目。施塔克曼认为，官员的私人爱好，比范家禁止入阁的规定的份量更重。

1928~1937年间，几乎每隔二年均编成

一个目录，这明显表示了宁波人对接收藏书楼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这4个目录的编者除北京赵万里外，大多来自宁波或在宁波工作。

如果说，清末民国初期，范家尚有自由支配权，就算不得不开放藏书楼，但允许外人入阁的时间也极短暂，那么到了1933年以后，地方政府和“文献委员会”的积极干预，极大地限制了范家的支配权，冯贞群成功地获得了较长的入阁时间，得以有充裕时间进行编目工作。

施塔克曼认为，1808年《天一阁书目》对于研究天一阁历史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收录了天一阁发展250年来所保存的书籍，它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天一阁藏书遭受重大损失前编成的，而且它还是现存目录中记录最详细的最早目录。

施塔克曼发现《天一阁书目》收录的藏书，手抄本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他认为手抄本没有特殊的收藏价值，因而范家不可能是特别偏爱收集手抄本。这说明了虽然中国于8世纪已发明了印刷术，但它未能象欧洲一样被广泛地应用，以致在清朝时，文献资料的手抄本仍占较大的比例。

最后，施塔克曼认为中国私人藏书楼的描述，可以用欧洲私人图书馆的实例加以衬托。他根据范钦的社会地位，选择了奥地利贵族图书馆，还按范钦仕途升迁历程，选择了萨穆埃尔·佩比斯(Samuel Pepys)图书馆作为比较的例子。虽然东西方文化存在着较大差异，但这两个图书馆都与天一阁有着相同之处。范钦与佩比斯有着类似的仕途经历，退出仕途后又从事图书收集。他们都致力于藏书的保存。佩比斯首先从审美观点出发，注重书籍装帧、书橱的设计等，范钦尤其注重书籍的防护，如防虫蛀的芸草，防火的池塘等，同时还引入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做法，如藏书楼命名取“天一生水”的含义等，以望达到藏书免于火灾的目的。

他们二人都把藏书完整地留给后世,但却采取了不同的途径:佩比斯以不得改变藏书为条件,赠送给了剑桥的老同事,后来发展成为公共图书馆;范钦则把藏书楼传给了后代,还制订了禁止外人入阁的严格规定。

奥地利贵族图书馆和天一阁都属于家族共有财产,且都留传了相当长的时间,但两者规模不同。

天一阁藏书也包括一些综合性文献,几乎涉及了中国所有的知识领域,并且可称之为百科全书。这表明范家具有相应广泛的知识成员。这与奥地利贵族图书馆相类似,他们有一群品行端正、学识渊博的容克地主组成的群体,从事大量的校勘工作。中国清朝也肯定有一个类似的组织。中国中上层地主阶级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是无疑的,但一般认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妨碍了通常的综合性教育,因此认为天一阁收藏的文献具有百科全

书的特征,则在某种程度上有疑问。

总之,施塔克曼对天一阁历史的研究,有助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尤其是中国的教育史。他强调,虽然天一阁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特殊意义,但在汉学界很少有人重视,中国一般图书馆的历史也很少有人研究。他希望中国图书馆历史的研究能被西方图书馆历史的研究所带动。

张树声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现为宁波市图书馆学会秘书长,副研究馆员。通讯地址:宁波市永丰路 32 号,邮编 315010。

郑继丰 同济大学化学系毕业,工程师,现为宁波市商检局干部。通讯地址:宁波柳汀街。邮编 315010。

(来稿时间:1995—02—25。编发者:黄文田。)

(上接第 80 页)

济水平相对较低的省反而走在前面,如此强烈的反差,难道不是领导的政策意识薄弱、宏观管理措施不力的具体反映吗?目前把本课程列为必修课或讲座的院校均属少数,列入选修课的是多数。而在选修课中,指定选修的又是少数,多数是 30 课时一个学分的任选修课,与其他诸如“名曲欣赏”、“书法艺术”、“唐诗选萃”等任选修课同等对待,这无疑是政策导向上的失误。又如对本课程的图书馆专兼职教师一律视为教辅人员,无疑又是忽视或不尊重文献课教师劳动的表现。至于文献课教师的培训费、教学设备购置费,也多占用图书馆常经费。这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其实质是领导政策观念薄弱,管理措施不力。

参考文献

1,2,7 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我国

高等学校情报用户教育现状及其展望调研综合报告。大学图书馆学报,1991(1~2):30~35

3 吴大梅。论《文献检索与利用》课开设、普及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大学图书馆学报,1992(2)

4 1992 年 5 月 5 日国家教委教高司《关于印发〈文献检索课教学基本要求〉的通知》

5 江乃武。大学生用户需求及其培训。大学图书馆通讯,1987(3):25

6 1985 年 9 月 26 日国家教委《印发〈关于改进和发展文献课教学的几点意见〉的通知》

8 徐鑫武。《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当务之急。大学图书馆学报,1990(1):4~8

9 广东省高校图书馆评估检测委员会。广东省高校图书馆评估总结。高教探索(广州),1991.(4):57~61

朱育培 1961 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现为汕头大学图书馆文检课主任,副研究馆员。通讯地址:汕头市鮑浦,邮编:515063。

(来稿时间:1995—03—21。编发者:徐苇。)